

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运行研究

——以伦敦为例

邓智团¹, 宁越敏²

(1.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上海 200020;

2.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在世界经济高速运行稳定发展过程中, 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本文以伦敦为例, 对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运行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有实力强大的经济体作为运行基础; 产业高端化, 产业结构高度服务化, 金融与商业服务业高等发达, 产业空间布局集群化; 高效的管理, 行政管理具高度独立性, 特殊高效的管理结构。最后, 引出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注, 并得出启示。

关键词: 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 成长; 运行; 伦敦金融城

中图分类号: F112.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国家战略, 但何谓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条件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 名义—功能分类法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 即将国际金融中心分为“功能中心”和“名义中心”(又称为“簿记中心”、“帐户中心”)(邓智团, 2005)。所谓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 是指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 创造大量就业和收入机会, 为全球客户提供借贷、投资、贸易结算、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和证券交易的国际金融市场所在的城市或地区(邓智团, 2006)。当今世界, 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指伦敦和纽约, 其运行载体分别是伦敦金融城、纽约华尔街, 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经济高度发展和产业服务化。关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研究调查报告再次确认了伦敦和纽约具有遥遥领先于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等其他金融中心的优势, 处于无可动摇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Mark Yeandle, 2005)。

本文以伦敦金融城为例, 探索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载体、产业状况与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竞争优势的相互关系。概括地说, 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运行必需重视三个方面: 一是实力强大的经济基础, 二是金融产业高度集聚的产业载体, 三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 引出对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注, 并得出几点启示。

2 空间区位

收稿日期: 2009-9-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D840185)资助。

作者简介: 邓智团(1979-), 四川达县人, 经济学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 金融产业与产业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将国际金融机构、各种金融市场、国际借贷者汇集于一地，并从事实际金融中介活动，这必然要求其位于一个空间区位优势、国际交往频繁的城市。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成长的空间区位主要指经济区位和时区区位，经济区位与时区区位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2.1 优越的经济区位

由于金融机构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经营许可证、专业人才、经营场所、设备以及投入资金的成本。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成本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审批制度的效率负相关，与金融管制的程度正相关，因此不同区位带来经营许可成本不同。一般来说，业务限制少或放松管制可增加某个地区的吸引力。对金融机构而言，人力资源的成本并非越低越好，金融机构首先需要的是具备必要的素质并接受过相应培训的专业人员。另外，金融机构在其区位选择决策中，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具有良好的信心，这也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香港与新加坡两个城市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起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2.2 恰当的时区区位

时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侯学钢、宁越敏，1997）。目前，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区分布特征就是集中在西欧、北美和东亚所在的时区。在北美，美国经济的绝对规模优势使纽约成为了金融中心；在西欧，因为英国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优势使伦敦成为了该时区中的金融中心；就东亚而言，日本的经济规模优势使东京成为与纽约、伦敦相并列的最高等级金融中心。因此，全球金融中心间的时区链条为纽约——伦敦——东京——纽约，时隔分别是 5 小时、9 小时和 10 小时。

3 经济量能

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一般而言属于经济推动型或称为自然形成型，它是随着国家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形成金融需求的不断扩大，进而自然地成为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和东京。从历史角度看，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存在联动关系，身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例如，13 世纪的威尼斯、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都是各自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到 18 世纪，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伦敦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20 世纪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国际金融中心也就从伦敦漂移到纽约，并且持续至今。

3.1 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龙头城市

在制造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制造业的生产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源。此时，企业的自有资金已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企业只能从外部筹集资金，或者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和股票，这都必将促进本国银行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以及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果制造国的资本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企业还会进一步向国外融通资金，而这往往要通过制造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使其走向国际市场，而制造国也就成为国际资金的净吸收者。

伦敦是世界经济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国家经济中心。19 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生产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英国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其地位是以英国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英镑作为世界贸易的通用货币以及英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的地位为基础的。一些英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对海外进行投资，特别是对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投资。20 世纪初，英国的海外投资高达 40 亿英镑，占西方投资总额的一半，英国成为国际

资本的供应国,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伦敦也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是另一个例子。拥有天然良港,腹地广阔的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在 1810 年就已取代费城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一战期间的中立使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美联储体系的建立和银行体制的改善,使金融机构在纽约迅速集聚,国际金融业务迅猛发展。战后的金本位制使美元与黄金保持稳定的兑换关系,美元称为国际结算货币,纽约迅速发展成为与伦敦相当甚至更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商业银行、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所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云集,并有许多外国金融分支机构。东京国际金融中心是经济实力与金融产业联动发展的典范。20 世纪 80 年代在日本雄厚经济实力支持下,加上日本原有的各类金融市场也不断扩展,东京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渐发展成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极大地提升了日本金融业的国际地位。

3.2 经济高度服务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城市的经济高度服务化。20 世纪中期,伦敦金融城的就业中第一次产业的人口比例已经接近 0。此时第二次产业还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占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主要由食物、饮料、烟草、药品及相关贸易、工程、电子物品和汽车金属物品、纺织、服装和鞋类以及印刷、出版业构成。其中印刷、出版在第二产业中占最重要地位,占二产比重超过 50%。但而后伦敦的制造业向郊区迁移,二产的比重逐渐下降。伦敦金融城有着“全球再保险业务技能中心”的美誉,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2003 年的保费收入高达 250 亿英镑;也是全球最大的柜台交易衍生业务市场,占全球交易额的 43% (2004 年 4 月统计);目前伦敦金融城是英国经济的绝对中心。以金融城为中心的伦敦金融业的产值占到英国 GDP 的 9% 左右,是英国的支柱产业,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英国经济总体增速的 3 倍多。金融和商业服务业所占比重加在一起已高达 12%,高于其它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

1971 年至 1989 年,大伦敦商品生产部门就业从 45 % 下降到 29 % ,金融和生产者服务却由 13 % 上升至 23 % ,伦敦区则从 11 % 上升至 19 % (Sassen,1991)。大伦敦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 1989 年时为 0.43%,并且逐年下降,到 1998 年仅为 0.2%,其比重远低于全英国的水平;第二产业总增加值比重在 1998 年时为 16.42%;第三产总增加值的比重在 1998 年时为 83.38%,特别是三产中金融服务业的比重很高。到 2002 年,大伦敦产业总值中工业总量比重低,产值仅占经济总量的 8%-9%,其中 33% 以上的产值来自于都市工业,如印刷与出版部门(英国印刷与出版部门产值占全国制造业的 28%)。伦敦制造业的衰落表现得最为激烈是从 1961 年到 1981 年,伦敦制造业的就业从 145 万人降到 65 万人。1983 年估计只剩下 58.3 万人,印刷与出版部门的从业人员占伦敦制造业就业总量的 36%。伦敦金融城的制造业人口下降更为明显,从 1881 年的 30% 下降到 2001 年的 1% (表 1)。

表 1 伦敦金融城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变化 单位: %

年份	1881	1911	1966	2001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	30	18	9	1

资料来源: Annual Business Inquiry,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 Ronald C. Michie, the city of London :continuity and change,1850-1990.p.17

1999 年伦敦金融城第二产业基本上都已全部迁出。从整个伦敦金融城的就业结构可以看出,1999 年时,伦敦金融城的第三产业超过总产业就业人口的 99%。其中以金融机构和商业服务两个行业的就业人口最多,分别占到了总数的 30.2% 和 28.9%,总计近 60% (表 2)。如果加上金融辅助机构,则这三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近 3/4。2002 年,在伦敦

所有的 25.5 万家增加值注册企业中, 服务型企业占了 86.1%, 制造业企业占 13.7%, 而同时英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71.3% 和 28.7%。

表 2 1999 年伦敦金融城的就业结构 单位: %

产业	比重	产业	比重
批发	1.9	房地产	1.9
零售	1.3	计算	1.7
酒店	4.2	其它商业服务	28.9
交通	0.2	公共管理	1.8
辅助交通	0.9	教育	1
邮政、电信	3.2	健康和社区	1
金融机构	30.2	成员组织	0.7
保险和养老基金	5.3	休闲、文化和体育	1.3
辅助金融机构	13.5	其它服务活动	0.2

资料来源: Dev Virdee and Tricia Williams (2003), Focus on London 2003, London: TSO。

4 产业生态

考察伦敦金融城的产业结构和布局, 可以发现其制造业绝对劣势服务业绝对优势的产业结构以及以金融为核心的产业空间布局使其金融服务全球中心的功能定位日趋强化。

4.1 用地以商务办公楼为主, 工业用地、居住用地比重极低

伦敦金融城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时, 都仍然是一个以居住和商务功能并存的中心城。随着伦敦金融城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 伦敦金融城的地价不断上升, 使得在伦敦居住的成本急剧提高。而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 人们更向往郊区的居住环境。因而到 20 世纪初时, 伦敦金融城中的居住人口就降到了 10% 以下, 到上世纪 60 年代时, 居住人口降至 1% (见表 3)。由于土地成本上升导致商务成本上升, 使得第二产业逐渐从中心城区向外围城区甚至向国外转移。

表 3 2001 年伦敦金融城居住人口数 单位: 1000 人

伦敦金融城	大伦敦	英国
7.2	7,188.00	58,836.70

资料来源: James Simmie (2002), The Changing City: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Use Change since the 1943 County of London Plan, Oxford : Oxford Brookes

目前伦敦的用地结构是以办公用地为主, 居住用地极少。正如上文所分析, 由于伦敦金融城地价的不断上升, 居住用地很难承担起这昂贵的地价。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空间的不断再开发, 居住用地不断地从内外迁。从 2001 年伦敦金融城居住人口总数仅为 7200 人, 而工作人口达到 30 多万 (见表 4)。

表 4 1966-1971 年伦敦金融城土地使用情况 单位: 公顷

年份	办工楼		零售		居住	
	1966	1971	1966	1971	1966	1971
面积	85	88	7	7	3	7

资料来源: Ronald C. Michie, the city of London : continuity and change, 1850-1990. p.17

4.2 总部经济发达、专业服务业汇聚

伦敦也是许多企业总部所在地,大约集中了全球跨国公司的 11.4%,仅次于纽约,排第二位。伦敦管理与行政类工作占制造业总就业量的 33%。金融服务业是大伦敦的重要经济部门,金融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每年创造 5%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和 190 亿英镑的贸易顺差(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两倍多),雇佣员工 100 余万。

凭借深厚的贸易渊源、一流的专业人员、高质量的配套服务以及语言、时区、法规等方面的优势,伦敦位居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列,在证券和外汇交易、海事和航空保险、债券和保险交易、银行间拆借等国际金融市场上占重要一席。共有 277 家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子行(1/3 来自欧元区),资产管理额高达 49690 亿英镑,占英国银行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2002 年,第一次产业的企业比重仅为 0.2%,远低于英国的 8.8%。在服务型企业中,企业数比重最多的是金融、房产及商业服务类,占到了总数的 41.3%,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27.5%)近 14 个百分点。

4.3 产业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

现代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韦伯^[6]指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或是一种生产的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就其企业集聚的原因,克鲁格曼^[7]认为,企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具有“历史依赖性”。伦敦金融城企业的空间集聚正好可以作此论点的最好注脚。John H. Dunning 对伦敦金融城产业的空间布局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认为伦敦金融城存在几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分别是出版、专业服务、银行、保险、制造业、交通、批发和商品等等几个部分。

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及相关专业服务业区位的分析,显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集中,最集中的就是伦敦金融城集群(圣保罗教堂的东面),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辅助金融机构、法律以及经纪公司。在所研究的行业中,保险的集聚度是最高的,达到了 0.57,主要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的东面。其次是职业招聘(Recruitment)为 0.56,银行业达到了 0.55,这两个行业都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的中部。而其它的专业服务的集中度相对较低,如会计仅为 0.23,法律咨询为 0.44,管理咨询为 0.36,同时也主要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的周围(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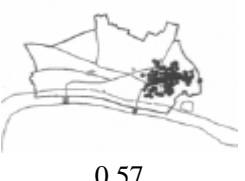












5 制度安排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将政府和机会作为两个变数加入了钻石体系中,从而建立了完整的钻石体系。波特认为,政府这项变数在国际竞争中,会对钻石体系中的四项关键要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国家优势,而且,其影响力可正、可负。马秀贞(2005)在探讨香港核心竞争力形成机制时,认为政府治理结构和管理因素是香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作为全球闻名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数个世纪的稳定发展的一个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有专门的市政机构和政府强大的创新能力,即“伦敦金融城当局”致力于维护伦敦金融城的全球地位。通过对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历史考察,其独特的政府治理结构为其良好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5.1 高度的自治权力

大伦敦当局首脑为大伦敦市长,他对整个大伦敦政府负责,主要包括通过伦敦交通局对整个大伦敦交通负责,通过伦敦发展局对经济发展负责等等。金融城最初只是商人们在一起喝咖啡、谈生意的地方,渐渐地,货物运输和保险业在那里发展起来。随着金融城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拥有了特权,政府为了吸引钱商富贾们,就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并让其保留一块专属领地。因而,伦敦金融城管理当局一直是独立的行政机构,有一个使自己保持

表 5 伦敦金融城产业集聚状况

企业实际分布点	集聚度	企业实际分布点	集聚度
	 0.55		 0.57
银行		保险	
	 0.44		 0.20
法律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0.36		 0.23
管理咨询		会计	
	 0.53		 0.56
商业服务		职业招聘	

资料来源: Taylor, P., Cook, G., Pandit, N. Beaverstock, J.V. and Pain, K. (2003), *Financial Services Cluster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London*, London: Corporation of London.

独立的古老宪章。早在 1215 年《大宪章》签署以前，其独立性就列入了约翰王(King John)签署的宪章中。市长冠以男爵头衔，地位比大伦敦市市长还高，其管理机构“伦敦金融城当局”被认为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地方管理机构，在行政上没有任何政党介入。这样的独立性使得伦敦金融城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5.2 极具优势的管理创新

金融城的管理者都是商人，为商业团体增加利益，政府官员是没有报酬的，都是金融城商界联合会代表选举产生的，市长一年一换，其他官员任期两三年不等。伦敦金融城市长相对大伦敦市长而言，是一个独立和互补的角色。作为伦敦金融城当局首脑，他代表了在伦敦金融城生活、工作或经商的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其附加的责任包括促进金融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包括在国内和国外的整个英国金融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负责，以及努力增强伦敦金融城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责任。伦敦市政府注重利用政策引导来增强金融城的吸引力，使英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向金融城集聚，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

伦敦金融城当局对伦敦金融城进行的具体管理是由伦敦金融城市长、市府参事议政厅、政务议事厅以及选举产生的官员等机构和人员组成的。伦敦金融城当局以提供成功金融服务

和行政事务服务为原则,为金融城的顺利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伦敦金融城当局还不遗余力的将维护伦敦金融城“品牌”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伦敦金融城市长,每年作为金融界颇具威信和说服力的外交使节,通过各种渠道沟通和出行访问,积极将伦敦金融城的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在了解世界各地金融发展的同时,维护了伦敦金融城国际形象的同时,也提高了伦敦金融城国际地位,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6 对上海的启示

通过探求伦敦金融城竞争优势来源,可以发现其领先全球的竞争力得益于其完善的运行机制,对正在加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上海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第一,上海具备功能型金融中心成长所需的时区区位。上海在世界时区上位于伦敦和纽约的中间,当上海开始办公时,伦敦正是午夜时分;上海一天的交易结束时,伦敦的市场交易活动却如火如荼;而到了上海的夜晚时,纽约的交易市场又开始了。这样通过全球电讯信息网的联结,上海、纽约、伦敦三个不同时区的金融中心联成一体,昼夜运转。当然亚洲时区有很多的竞争者,如东京、香港、新加坡等等,不过上海可以凭借中国大陆的庞大经济腹地作为后盾,寻求功能上的互补关系而得到发展。

第二,上海具备国际金融中心所需的经济实力,占居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业、金融辅助业和相关的商业服务业为稳定其国际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来源基础。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经济区长三角的龙头,经济发展水平为全国最高。根据库兹涅茨(1989)统计分析得出的经验性依据,上海已经进入了他所谓的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这将极大增加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使得浦东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目标进一步清晰明确,将成长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和金融产业及相关服务亚洲区域的中心之一。

第三,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各类金融产业集中布局,降低高技术人才的集聚和信息搜索成本,陆家嘴已继续做好城市空间规划,促进区域内金融机构合理布局,提高浦东国际金融中心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并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90年代初,证券和资金拆借等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在上海建立,初步确立了上海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至2008年底,集聚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近500家中外资金金融机构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与成熟的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金融机构聚集度不够,金融机构数量与质量上的差距明显。

第四,继续发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在政策和政府管理上创新的优势,推动管理创新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作为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浦东先试先行发展的机遇,正为各类创新搭建平台。当前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国内同样面临经济、金融发展困境。因此,上海应借助浦东这个创新平台,帮助金融机构设计创新方案,加快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影响力,推动上海成为具更广泛范围影响的跨区域性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 [1] 邓智团.伦敦金融城的成长模式和发展优势[A].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编.2005-2006 上海金融发展报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 邓智团.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变[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 [3] Mark Yeandle, Michael Mainelli and Adrian Berendt.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M]. London: Corporation of London, 2005.
- [4] David Lascelles, Denis Lapotko and Mark Pitcher.Sizing up the City London's Ranking as a Financial Centre[M].London: Corporation of London,2003.

- [5] Mayor of London, The London Pla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M]. London :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04.
- [6] 丝基雅 沙森.全球城市[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7] 阿尔弗雷德·韦伯著.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著.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9] 俞文华.战后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及其动因[J].城市问题,1999(2):58-61.
- [10] 马秀贞.香港核心竞争力形成机制探源及启示[J].中国城市经济,2004(2):41-43.
- [11] Richard Roberts (editor,199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M].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12] David R. Meyer(1991).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London and its Intermediaries [A].Resat Kasaba(ed.),Cities in the World-system[M].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97-106.
- [13] John H. Dunning.The City of London : A Case Study in Urban Economics[J].Town Planning Review,1971,40(3), 207-31.
- [14] 侯学钢、宁越敏.时区对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上海城市规划,1997(1):8-12.

On the Growth and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case study for London

Deng Zhituan¹, Ning Yueming²

(1.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0020;
2.The Center for Chinese Modern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During the high-spe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FFC)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economy hub.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London, the article made a deep research on the growth and operation of IFFC. There come to some conclusions: a strong economies running as the basis of IFFC; high-end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igher well-developed spatial clusters of industries; efficient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special and highly efficient management structure. Finally, it leads to draw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 Financial Cent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operating mechanism; London